



“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

“无皮书”

十年“文革”期间,我作为67届初中生与广大“老三届”一样经历了一段知识恐慌、无书可读的艰难岁月。人生最宝贵的长知识的学生时代和爱读书的美梦被“破四旧”的浩劫给毁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价值导向是,以不读书为豪、以知识少为荣耀。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高压之下,许多人都不敢收藏和阅读书籍,怕引火烧身。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内,时常有胆小怕事或“出身不好”的人悄悄把一捆捆旧书扔在那里。看到那些精致的中外文学名著,我的心里暗生激动和惊美,真想捧回家。但因为怕有红卫兵的“暗哨”在“伏击”,当时我万万不敢捡书回家,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些书被红卫兵们作为“战利品”上交。

一天,我在马路边闲逛,偶然捡到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校教科书,书的主编当时被贴大字报和挨批斗,人被打倒,书被抛弃。我乘人不注意悄悄捡起书带回家。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书皮撕掉,贴上牛皮纸伪装,成为文革时代最典型的“无皮书”。“无皮书”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所谓“无皮书”,其实原本也是有封皮的,只是为了规避风险,读书人故意撕去书的封面,贴上牛皮纸作封面,掩其面目,避人耳目,这是迫不得已的奇特读书方法。

交换,觉得难为情,我就萌生了以“手抄书”换“无皮书”的念头。我用硬面抄(当时最好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七百首》,作为与人交换看书的筹码,竟然卓有成效,收获颇丰。此外我还抄写过《成语词典》和《汉语词典》,把一些自认为好的语汇作了大量的摘录,无形中提高了语法与修辞能力。这些“手抄书”自然也应归入“无皮书”一类。

小小理论辅导员

20世纪70年代初,部分图书馆开始有限开放,以革命书籍为主,此外还以供人“批判”的名义开放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无皮书”的阅读方式逐步消退。当时我在企业上班是“三班倒”,每逢夜班下班,睡一觉之后,我总会到上海市图书馆和黄浦区、卢湾区图书馆这三个离家最近的图书馆去看书。

一开始走进图书阅览室,什么书都看看。后来主要聚焦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还有《鲁迅全集》,郭沫若、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等名家的诗集,做了十几本读书摘记。一时间还想入非非,期望有朝一日仿效我们三万人大厂中工人作家的榜样,尝试走写作的道路。尽管有点好高骛远,倒也促使我有了新的追求,进一步充实了知识基础和文化积累。

1972年,毛泽东倡导干部党员学习《共产

党宣言》。从此我开始迷恋马列原著,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系统而全面攻读原著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72年,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之后,我读经典原著、学马列理论也更加坚定而自觉。

“以工代教”进党校

1977年上海市委党校复校,我“以工代教”,被借调到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担任教学人员。到处是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浓厚氛围,学员学习的教材就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教师开设的课程就是原著解读和原理辅导,党校人的基本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教师中有自学成才的“老马列”,有科班出身的老专家,他们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导师和榜样。在老领导、老教师的带领下,我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功底。

在党校复校后开办的第一、第二期领导干部读书班中,我都担任班干事,有幸与哲学教研室的沈佩英、朱伊卓两位资深教师搭档。在班级管理 and 教学活动中,我经常向她们讨教如何学哲学的方法,交流学习辩证法的感悟,兴奋地谈论哲人哲语和哲学命题。她们的能言善辩与哲学教研室高为学等男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文字功夫相互辉映,毫不逊色。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马

行走在江边的木栈道上,缕缕江风拂面而来。不远处,几只水鸟起起落落,并不惧三三两两的游人,时而嬉戏,时而休憩。在这个春末夏初的午后,我再次来到渔人码头的亲水平台,在这里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

锈迹斑斑的栏杆上,每一个印记都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造纸厂、修船厂、自来水厂、棉纺厂、发电厂……这些曾在远东赫赫有名的工厂,有的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有的仅留下残迹供人们回想,而有的,正在焕发勃勃生机。

走在杨树浦发电厂遗址公园中,会看到一位工人的雕像,他叫王孝和,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前上海电力系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948年4月被捕入狱,同年9月壮烈牺牲。年仅24岁的王孝和在被宣判死刑后坦然面对,坚定的笑容被登上《大公报》,“信仰的微笑”震慑了反动当局,也震撼了整个社会,至今仍激励着9000多万党员奋进、前行。

不远处,灰墙红瓦的杨树浦水厂静静伫立。140年以来,这座城堡式的建筑不间断地为上海市民输送着清澈的自来水,它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勃发、抗争、衰落与新生,更见证了上海这座光明之城的百年沧桑与世纪辉煌。今天,深度改造的水厂又以新的技术、新的面貌,为数百万市民的美好生活送来甘甜。

滨江栈道的另一端是秦皇岛路码头。100多年前,一艘艘邮轮在这里鸣笛起锚,带着一批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远渡重洋、上下求索,开启追求真理的征程。时隔两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些赴法学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的中坚力量。百年回眸,当年远离故土的学子回望电厂高耸的烟囱,是否会看到今日江边行人的悠然?是否会绽放“信仰的微笑”?

漫步江畔,嘹亮而悠远的汽笛声响起,又一艘轮船驶过,承载着历史与梦想,跨越了百年烟云,与新时代的彩虹交汇,驶向远方。(作者系调研督查处副处长兼党支部书记)

滨江漫步

○ 薄其君

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并影响人的一生

○ 袁秉达

我躲在家里阅读“无皮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开始如读天书。一个懵懂的少年,遭遇高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直是一头雾水。后来我奉行“一本书主义”,从头到尾反复读,连猜带蒙悟原理,似懂非懂、磕磕碰碰,竟慢慢看懂了,还做了不少摘抄和笔记。最后,竟然开始迷恋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认识论、真理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基本原理。等我逐步自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启蒙以后,时常苦于无人交流,因此常与中学政治老师探讨哲学命题。老师只觉得我少年老成,殊不知是“无皮书”赋予我智慧。

1968年,我18周岁,被分配到上钢一厂当上了钢铁工人。我结识了一批来自虹口区的“老三届”同事,不少人家有藏书。渴望读书求知的年轻人志同道合走到一起,青春年少的心灵始终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没有过错”。那时,借书、还书、读书还是首推“无皮书”。包上牛皮纸封面,裹在“申报”中,单线联系,悄悄传递,使眼神、打暗语,约接头地点和换书方式,如同搞地下工作。一个同事上班时阅读“无皮书”《赫鲁晓夫回忆录》被告发,不仅书被没收,而且在全车间职工大会上点名批判,班组学习会专门批评教育,本人写书面检讨。经历这次暴风骤雨以后,我们处处小心、事事谨慎,此后,类似“事故”再也没有发生过。

钢铁厂学徒期间,我从同事手中借阅了不少文学名著。一本本借阅,还做了摘记,没书源时,就阅读笔记。老是向人家借阅,无书

交换,觉得难为情,我就萌生了以“手抄书”换“无皮书”的念头。我用硬面抄(当时最好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写了《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七百首》,作为与人交换看书的筹码,竟然卓有成效,收获颇丰。此外我还抄写过《成语词典》和《汉语词典》,把一些自认为好的语汇作了大量的摘录,无形中提高了语法与修辞能力。这些“手抄书”自然也应归入“无皮书”一类。

我在上钢一厂的工种是高炉车间炉前工段的卷扬机工,在机房内看管自动化电器设备,一般机器设备运行正常,人就无事可干。在“文革”期间,读马列著作是革命之举。即使在上班时间读马列原著也无人反对。于是,我一心两用:眼看马列著作,耳听机器设备。无论在家或者上班,天天都在读马列原著,以至于在党支部学习会上,我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了小小理论辅导员。在两年之内,我以极大兴趣通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经典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原著。边读书边做摘记,还注意收集学习马列著作的辅导资料。潜移默化、大有长进。也许是自己特别喜欢的缘故,所以特别容易进入角色,也特别能够消化和吸收。同时,前期大量文化阅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积淀,也成为学好马列原著的重要铺垫和扎实根基,更关键的是养成了一种刻苦自学的良

好习惯。从此我开始迷恋马列原著,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系统而全面攻读原著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72年,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之后,我读经典原著、学马列理论也更加坚定而自觉。

1977年上海市委党校复校,我“以工代教”,被借调到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担任教学人员。到处是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浓厚氛围,学员学习的教材就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教师开设的课程就是原著解读和原理辅导,党校人的基本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教师中有自学成才的“老马列”,有科班出身的老专家,他们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导师和榜样。在老领导、老教师的带领下,我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功底。

在党校复校后开办的第一、第二期领导干部读书班中,我都担任班干事,有幸与哲学教研室的沈佩英、朱伊卓两位资深教师搭档。在班级管理 and 教学活动中,我经常向她们讨教如何学哲学的方法,交流学习辩证法的感悟,兴奋地谈论哲人哲语和哲学命题。她们的能言善辩与哲学教研室高为学等男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文字功夫相互辉映,毫不逊色。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马